

外国语言文学学术论丛
Academic Monographs on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塑造自我文化形象

——中国对外文学翻译研究

马士奎 倪秀华 著

A Study on the Tradition of "Outward"
Literary Translation in China:
From Late Qing Dynasty to the First Thirty Years of the PRC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外国语言文学学术论丛

塑造自我文化形象

——中国对外文学翻译研究

A Study on the Tradition of “Outward” Literary Translation in China:
From Late Qing Dynasty to the First Thirty Years of the PRC

马士奎 倪秀华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塑造自我文化形象：中国对外文学翻译研究/马士奎，倪秀华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6

(外国语言文学学术论丛)

ISBN 978-7-300-24405-1

I. ①塑… II. ①马…②倪… III. ①文学翻译-研究-中国 IV. ①I0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92191 号

外国语言文学学术论丛

塑造自我文化形象

——中国对外文学翻译研究

马士奎 倪秀华 著

Suzao Ziwo Wenhua Xingxiang—Zhongguo Duiwai Wenxue Fanyi Yanjiu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玺诚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70 mm×24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张 17.25

印 次 2017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字 数 271 000

定 价 5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本书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结项成果。项目名称：《塑造中国形象——新中国三十年对外文学翻译研究》，项目批准号：09YJA74010；本书为中央民族大学学术团队建设基金项目成果之一，项目名称：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典籍英译研究，项目批准号：2015MDTD02C。



序

辜正坤

马士奎教授在中国文学外译史方面有颇深的造诣。现在，马士奎博士和倪秀华博士合作完成的这部专著标志着他们在对外文学翻译研究方面又有了新的进展。

当前，中国文学和文化“走出去”问题已成为学术领域的一大热点。实际上，自晚清以降，就有不少有识之士在如何“送出”中国文学方面做过多种尝试，且有不少成功的先例。因此，梳理前人经验，总结成功与不足，对施行和推进当下文学和文化“走出去”的文化战略，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本书的研究范围分为三个阶段，涵盖晚清时期、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时期，对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对外文学翻译活动进行了较全面的考察。作者重点关注了不同历史阶段的翻译环境、文本选择原则、翻译策略以及译出作品在塑造中国文化形象中所起的作用等。全书内容丰富，资料新颖、翔实，所举译例颇具代表性。

本书还披露了若干被历史湮没的译人、译事、译著，具有相当的趣味性。作者对新中国成立前自发的个人翻译行为和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高度统一的国家翻译模式各自的利弊，作了比较细致的分析，这对当今的文学译出和文化推广有一定的借鉴价值，特郑重推荐，以飨翻译界同好。

是为序。

乙酉年正月于北京大学畅春园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外语出版分社读者信息反馈表

尊敬的读者：

感谢您购买和使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外语出版分社的 _____ 一书，我们希望通过这张小小的反馈卡来获得您更多的建议和意见，以改进我们的工作，加强我们双方的沟通和联系。我们期待着能为更多的读者提供更多的好书。

请您填妥下表后，寄回或传真回复我们，对您的支持我们不胜感激！

1. 您是从何种途径得知本书的：

书店 网上 报纸杂志 朋友推荐

2. 您为什么决定购买本书：

工作需要 学习参考 对本书主题感兴趣 随便翻翻

3. 您对本书内容的评价是：

很好 好 一般 差 很差

4. 您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现明显的专业及编校错误，如果有，它们是：

5. 您对哪些专业的图书信息比较感兴趣：

6. 如果方便，请提供您的个人信息，以便于我们和您联系（您的个人资料我们将严格保密）：

您供职的单位：_____

您教授的课程（教师填写）：_____

您的通信地址：_____

您的电子邮箱：_____

请联系我们：贾乐凯 黄婷 程子殊 于真妮 鞠方安

电话：010-62515580, 62512737, 62513265, 62515037, 62515576

传真：010-62514961

E-mail: jjalk@crup.com.cn huangt@crup.com.cn chengzsh@crup.com.cn

yuzn@crup.com.cn jufa@crup.com.cn

通信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甲 59 号文化大厦 15 层 邮编：10087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外语出版分社



目 录

第一章 塑造自我文化形象：中国对外翻译现象研究	1
小引	1
一、翻译的功能——塑造异文化形象和自我文化形象	3
二、对外翻译与自我文化形象的塑造	6
三、对外翻译与中国文化形象	13
本章小结	18
第二章 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对外文学翻译传统的肇始和形成	20
小引	20
第一节 英美出版的中国文学译作	22
一、旅美和旅英学人的译介	22
(一) 蔡廷干和《唐诗英韵》	27
(二) 熊式一译中国传统戏剧	43
(三) 初大告译中国诗文	46
二、中外合作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	47
(一) 中外合译古典文学作品	48
(二) 中外合译现代文学作品	50
第二节 国内出版的中国文学译作	56
一、国外在华机构出版的译作	56
二、国内出版的古典文学译作	61
(一) 英译古典诗词	61
(二) 张则之及其英译《北平民谣》	67
(三) 英译古典小说	83
(四) 英译长篇笔记体散文	87



三、国内出版的现代文学译作	90
(一) 英译现代小说	90
(二) 英译现代戏剧	96
第三节 国内早期英文期刊对中国文学的译介	98
一、早期英文期刊与中国文学的传播	98
二、《中国简报》及其译介中国现代文学的尝试	101
三、《天下月刊》及其在译介中国文学中的成就	103
第四节 早期旅法学人对中国文学的译介	109
一、早期零星的译介活动	110
二、晚清中学西渐的真正先驱——陈季同	111
三、曾仲鸣译介中国古今诗歌	115
四、敬隐渔与中国现代小说法译之开端	117
五、徐仲年与中国诗文的法译	118
六、梁宗岱与法译《陶潜诗选》	121
七、罗大冈与中国古诗文的翻译	122
八、其他旅法学者的贡献	124
本章小结	126
第三章 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作为国家行为的对外文学翻译	137
小引	137
第一节 作为国家行为的对外文学翻译	137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家新使命	138
二、国家权力话语对对外翻译的赞助与制约	140
(一) 翻译的政治定位	140
(二) 对外翻译的赞助机构——作为国家对外 宣传机构的外文出版社	141
(三) 中国文学的翻译、出版与销售	145
(四) 编、译者主体性的弱化	150
第二节 英译中国文学作品与新中国形象构建	152



一、《中国文学》英译概览	153
二、外文出版社英译中国文学作品单行本出版总论	155
(一) 古典文学作品的英译	160
(二) 现代文学作品的英译	162
(三) 当代文学作品的英译	171
第三节 革命历史小说英译个案分析——《林海雪原》英译	180
一、革命英雄传奇：《林海雪原》	180
二、从革命英雄到意识形态典范	182
(一) 具有集体主义精神的崇高思想	182
(二) 言行文明	191
本章小结	196
第四章 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到改革开放之前：特殊	
背景下的文学输出	208
小引	208
第一节 “拿来”与“送出”的相对平衡	209
第二节 “样板戏”的翻译	213
第三节 浩然等少数作家作品的翻译	218
第四节 其他作品的翻译	221
第五节 毛泽东诗词的翻译	224
一、文学文本与政治文本	224
二、缩微“译场”——特殊经典的翻译方式	226
三、“定本”和“范本”——比较视角下的毛诗 1976 英译本	229
本章小结	237
结语	244
参考文献	249
后记	265



第一章

塑造自我文化形象： 中国对外翻译现象研究

| 小 | 引

人们常常会忽略翻译的方向问题，想当然地将其看作是单一地由外语转换到母语的行为。实际上，翻译是两种语言之间的信息转换，这种传递并非是单向的。就方向而言，翻译的形式有三种，可以由外语（foreign language）或非惯用语言（language of non-habitual use）到母语（mother tongue）或惯用语言（language of habitual use），也可以是由母语或惯用语言到外语或非惯用语言，而对掌握两种或数种外语的译者来说，其所从事的翻译也可以是由一种外语转换到另一种外语。

对于从母语到非母语的翻译，目前国际上尚无通用的术语，而且现有几种比较常用的命名方式大多带有负面含义。有些学者称之为“逆向翻译”（inverse translation），^①但这一命名本身带有某种程度上的价值观判断，其前提是默认译入母语的翻译为正道，不能起到为此类翻译正名的作用。已故英国著名学者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用“服务性翻译”（service translation）来指称“由惯用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翻译”（translation from one's language of habitual

① Allison Beeby Lonsdale, "Direction of Translation (Directionality)," in Mona Baker (ed.), *Routledge Encyclopa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 64.



use to another language),^① 此概念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这种方向的翻译实践处于边缘地位,基本上局限于应用文体。也有一些人将其表述为“非母语翻译”(non-mother tongue translation)。^② 另外,值得指出的是,英语中的“prose translation”和法语中的“thème”可以表示译入外语的翻译实践,但这两个术语的适用范围一般局限于语言教学和考试等领域,而且前者的此种含义现已少为人知,只有个别学术著作依然采纳这种用法。^③ 其他的称谓还有“译入第二语言”(translation into the second language)^④,以及“二语翻译”(L2 translation)^⑤等。我国翻译界一般将国内这种方向的翻译称作“中译外”或“对外翻译”,在英文中多译作“translation from Chinese into foreign languages”,相关著述中常见的英文表达还包括“outward translation”^⑥和“export translation”^⑦。在英语等语言中至今尚没有被广泛接受的专门术语,这也反映了非母语翻译长期遭遇冷落的现象。

“对外翻译”是指由译者所从事的将本文化作品译入其他语言的翻译活动,亦即从母语或惯用语言到外语或非惯用语言的翻译,以异文化的读者为主要对象。这里所说的对外翻译通常不包括具有明显双重文化和双语生活背景的人所从事的翻译。^⑧ 对外翻译是一种文化的自我协调行为。当某一文化在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中出现明显入超,翻译不平衡现象比较严重时,自然会采取一些措施,去影响并且进入异文化,以图消解所存在的逆差,达到或接近翻译和文化交流的相对

-
- ① Peter Newmark,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p. 52.
- ② Nike K. Pokorn, *Challenging the Traditional Axiom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 2005), X; Meta Grosman, “Non-Mother Tongue Translation—An Open Challenge,” in Meta Grosman et al (ed.), *Translation into Non-Mother Tongues: in Profession Practice and Training* (Tubingen: Stauffenburg-Veri, 2000), p. 45.
- ③ Allison Beeby Lonsdale, “Direction of Translation (Directionality),” p. 5.
- ④ J. Weatherby, “Teaching Translation into L2,” in K. Malmkjser (ed.), *Translation and Language Teaching: Language Teaching and Translation* (Manchester: St Jerome, 1998), p. 21.
- ⑤ Dermot Heaney, “Negotiating Communication Style, Situational Context and TT Models in Advanced L2 Cultural Mediation Pedagogy: A Case Study from the Italian-English Translation”, *Noitas-Royal (Research on Youth and Language)*, 2 (2011): 229; Natasa Pavlovic, “Direction in Collaborative Translation Processes,” Universitat Rovira I Virgili, Spain, 2007: IV.
- ⑥ Chan, Leo Tak-hung, “Conclusion,” in Leo Tak-hung Chan (ed.), *One into Many Translation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Amsterdam: Rodopi, 2003), p. 321.
- ⑦ 彭发胜:《〈天下月刊〉与中国现代文学的英译》,《中国翻译》2011年第2期,第23页。
- ⑧ 例如,对久居海外的华人来说,所在国的语言也已成为其惯用语言,他们所翻译的中国作品通常不属于典型的对外翻译。



平衡状态。这是许多文化皆有的本能，只不过在具体环境中其行为和结果都会有所不同。改变翻译不平衡局面的措施主要有两种，一是介入、干预异文化中的相关翻译行为，二是开展译出母语的对外翻译。二者都是一种文化在面对翻译不平衡状况时进行自我协调的具体途径，目的是求得在世界文化大系统中的生存空间，并且发出自己的声音。

对外翻译与一般翻译是方向相反而又相互呼应的两种文化交流行为，通常都以服务翻译行为所发生的社会为目的。一般翻译可以在本文化中塑造出异文化形象，对外翻译则致力于在异文化中塑造出本文化的自我形象。

一、翻译的功能——塑造异文化形象和自我文化形象

人们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去认识一种文化。翻译是历史最悠久、最常见的文化交流方式之一，也是了解异文化的一个重要渠道。翻译的过程也是在目的语文化中塑造源语文化形象的过程。译作是原作及源语文化在目的语文化中的代表。借助译作文本，目的语读者可以首先获得对原作和原作者的认识，然后推而广之，形成对源语文学、文化和社会的整体印象。翻译的一个重要功能即是在目的语文化环境中塑造出原作所处社会的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或文化形象（cultural image）。

翻译不仅是了解异文化和丰富本文化的重要途径，而且是扩大本文化影响、促成本文化为外界所认识的手段。翻译不仅可以在本文化中塑造出异文化形象，而且可以在异文化中塑造出自我文化形象。通过翻译行为塑造本文化自我形象的手段有两种，一是介入异文化中对本国作品的翻译过程，促进或促成本国作品的输出，二是对外翻译。

一个社会往往希望最能够体现本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要求的作品进入异文化，充当本文化的代表，同时注意避免输出与其观点相抵触的作品，为此有时会试图通过某种方式干预异文化译者的翻译过程，影响其对本国作品的选择，引导目的语读者对本文化的认识，进而影响本文化在目的语社会中的形象。尤其在关系比较密切的国家之间，通过各种途径向对方推荐本文化中的代表性作品的做法并不罕见。如 20 世纪 50 年代，面对中国翻译苏联作品过多、过滥的局面，苏联有关



方面曾表示“希望中国翻译的苏联书籍都是最好的书，而不是有错误或缺点的书”，并且希望中方在确定翻译选题时考虑苏方的意见。^① 苏方这种做法的初衷即是担心因中国译者的选择标准与苏联社会自身的评价标准不一致，引进思想内容与其主流意识形态观点不一致甚至相冲突的作品，从而导致中国读者对其社会的认识产生混乱。20世纪60年代初，朝鲜出版部门曾建议中朝两国在相互翻译对方国家的书籍时，要事先征得对方的同意。^② 新中国成立后，也曾有相关机构向一些国家推荐可以翻译的书籍，原则上“应该是质量较高的本国著作”^③，并且尽可能避免内容不适宜的作品^④。

一些机构或个人有时会将本国有代表性的作品介绍、推荐给异国译者，主动发起、促成甚至直接参与组织异文化中的相关翻译活动，以扩大本国作品和文化的影 响，因而绝大多数国家支持本国作品外译的力度远大于对外国文学的译介。由国际笔会和西班牙巴塞罗那的拉曼·鲁尔研究院（Institut Ramon Llull）发起、各国笔会中心合作完成的《译出与否——PEN/IRL 国际文学翻译形势报告》（To Be Translated or Not to Be—Pen/IRL Report on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of Literary Translation）^⑤ 显示，各国文学的外译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倘若没有源语国家的资助，出版机构特别是英美出版社通常不愿意出版源自其他语言的作品。政府介入文学外译最常见的手段是通过专门机构为相关出版社直接提供资

① 1953年2月13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向相关部门发布《翻译苏联书籍应报送计划和目录，以便征求苏方意见》的通知，称苏联国际图书公司北京分公司经理克拉希里尼柯夫向中国国家出版总署提出两项意见，其一便是要求中国方面把各翻译出版单位翻译苏联书籍的计划和目录通知他们，以便转告莫斯科国际图书公司，由该公司征求各书的原著者和原出版者的意见，供中国方面参考，以保证中国翻译出版的苏联作品都是“最好的书”；其二是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发表以后，有些以前出版的经济学和集体农庄方面的书存在问题，提请中方注意。稍后该署又发布《关于翻译苏联书籍征求苏方意见的补充通知》，要求报送翻译苏联作品的计划和目录。见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办公室编《出版工作文件选编》（1949—1954），1983，第252—253页。

② 见《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通知翻译朝鲜书籍必须征求朝方意见出书后应向朝方寄赠样本》，载《出版工作文件选编》（1958—1961），第121—122页。

③ 文化部于1956年3月发布的《关于改进出版社报送可对外赠送、交换及可提供外国翻译图书参考目录的规定》，要求“对外赠送、交换的书籍”应避免“质量不高的和只适合本国读者阅读的图书”；同时，“提供外国翻译的书籍，应该是质量较高的本国著作，在报送该项书目时，除填写书名、著作人等项目外，并应填写500字左右的内容简介（例如：学术著作主要是研究和解决什么问题的，主要人物的典型意义如何，等等），以供国外参考”。见《关于改进出版社报送可对外赠送、交换及可提供外国翻译图书参考目录的规定》，载《出版工作文件选编》（1949—1957），第258页。

④ 文化部于1956年10月6日发布的《关于我国处理国际著作权问题的通知》曾提到，当外国某些“进步”团体、机构和人士提出翻译中方作品时，“对方所选择的书籍不适于翻译时，可通过国际书店劝告他们不要翻译，并尽可能主动地向他们另行推荐适于翻译的书籍”。见《出版工作文件选编》（1949—1957），第273页。

⑤ 该报告于2007年由拉曼·鲁尔研究院印刷出版。



助，或者为本国作品的译出营造条件。如巴塞罗那的拉曼·鲁尔研究院在 2003 至 2007 年间为 250 余本图书的外译提供资助；成立于 1991 年的“荷语文学创作和翻译基金会”（Foundation for the Production and Translation of Dutch Literature）^① 常年为出版荷语文学译作的国外出版机构提供资助，符合条件的作品可以获得 70% 的翻译费用支持。1951 年创办的德国歌德学院（Goethe-Institut）为重要图书的外译提供翻译费用，过去 30 余年间共资助 4 000 余种德国作品以 45 种语言出版，仅 2007 年就有 128 家出版社获得资助，资金主要由德国外交部和出版局提供。法国政府向来高度重视在世界各地特别是美国推广法国文学，法国国际出版总署（Bureau International de L'édition Française, BIEF）早在 1873 年即告成立，得到法国文化与交流部及外交部的支持。性质类似的机构还有创建于 1963 年的“柏林文学论坛”（LCB）、法国国家图书中心（CNL）、爱尔兰图书交流公司、波兰图书协会、芬兰文学信息中心和韩国文学翻译院等。一些较大的欧洲国家还在国外设立出版中心或办事机构，并且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以加强与所在国出版界的交流，扩大本国文化和文学的影响。比如德国及其他德语国家在纽约、北京、莫斯科、华沙和布加勒斯特等地开设了德语图书办公室。法国大使馆图书处与美国笔会中心合作设立了针对英译法语图书的“海明威翻译奖”，并且于 2006 年启动“法语之声”（French Voice）项目，推动美方翻译出版 2000 年后问世的法国书籍，入选图书可获得 6 000 美元的翻译费资助。此外，许多国家在海外设立语言教学和文化中心，旨在增强所在国对本国文化的兴趣，如拉曼·鲁尔研究院、英国文化委员会、歌德学院、法语联盟（Alliance Française）、塞万提斯中心和意大利文化院等。我国近来也认识到介入异文化中的翻译行为对推广中国文化的重要性，陆续推出了“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和“大中华文库”等多种项目，以政府资助翻译费用的方式，鼓励各国出版机构翻译出版中国图书。^② 对异文化中翻译活动的介入和干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扩大本国文化的影响，减少外界对本国文化的误读，促使异国译者塑造的源语文化形象达到或接近源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期望。

^① 该机构已于 2010 年并入“荷兰文学基金”（Dutch Foundation for Literature）。

^② 张隽：《政府出资翻译 助中国图书走向世界》，《中华读书报》2005 年 8 月 31 日。



但这种对异文化中翻译行为的干预是间接的，将源语社会的意志寄托在目的语社会译者身上，需要来自异文化的协作和响应。比较而言，对渴望被外界认识的一些国家来说，对外翻译是一种主动在异文化中塑造自我文化形象的重要手段。

二、对外翻译与自我文化形象的塑造

一般意义上的翻译多是指译入母语的翻译，这在各文化中都属典型的翻译方式，甚至经常被视为唯一可行的翻译；译出母语的翻译常常被忽视，在西方尤其是英语世界更是如此。这就是翻译界约定俗成的“母语原则”。这一不成文的原则首先体现在一些行业组织和机构明确表示不承认非母语翻译的可行性。1976年发布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通过法律保护译者和译作权利及提高译者地位的建议（《内罗毕宣言》）指出：译者应尽可能将作品译入自己的母语或译入自己掌握程度等同于母语的語言。^① 国际翻译家联盟在其网站上特别强调“职业译者应该从事译入母语的工作。”^② 另据一些学者的研究，许多国家的翻译协会在其职业行为规范中，明确要求成员译入自己的母语，除非译者真正拥有双语背景。^③ 另一方面，“母语原则”还表现在许多业内人士，包括欧美翻译界、语言学界和文学界的一些学者否认非母语翻译行为的合理性，或者对此类译作的质量持怀疑态度。如早在15世纪，德国杰出的宗教改革家和圣经翻译家马丁·路德即主张从外语译入母语方能令人满意，这样的译作才算得上真正的翻译^④；18世纪德国哲学家赫德尔也认为，现实生活中，理想的翻译是从外语到母语^⑤。当代学者中持类似观点者不计其数，如在纽马克看来，译入非母语的作语言往往不够自

① Catriona Picken (ed.), *The Translator's Handbook* (London: Aslib, 1989), p. 245; Allison Beeby Lonsdale, "Direction of Translation (Directionality)," in Mona Baker (ed.),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 64.

② Natasa Pavlovic, "Direction in Collaborative Translation Processes," Universitat Rovira-I Virgili, Spain, 2007; 7.

③ G. Samuelsson-Brown, *A Practical Guide for Translators* (Lon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2004), pp. 12-13.

④ L. G. Kelly, *The True Interpreter: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West*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9), p. 110; W. Schwarz, "The History of Principles of Bible Translation in the Western World," *Babel*, 9 (1963): 18.

⑤ Nike K. Pokorn, *Challenging the Traditional Axiom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 2005), p. 28.



然，充斥“无法接受而且不大可行的搭配，”唯有译入惯用语言，才有可能取得最为令人满意的效果。^① 纽马克的这一观点在整个欧洲很有代表性，在没有特别说明的情况下，人们通常会想当然地认为翻译的方向就是译入母语。著名学者韦努蒂（Lawrence Venuti）等也强调翻译的目的语必须是译者的母语。^② 语言学界持类似观点者也不乏其人，如 Marmaridou 认识到“从外语到母语的译作一般优于从母语到外语的译作”，而且“职业译者通常都会被要求，并且也更情愿译入自己的母语。”^③ 时至今日，“母语原则”仍被许多人奉为翻译行业的一条“黄金法则”（golden rule）。^④ “母语原则”也表现在欧洲一些学校及培训机构曾经存在对非母语翻译教学的冷落。在英国学者迪肯斯（James Dickins）等看来，“译员培训通常主要围绕译入母语的翻译行为，这一方向的译作要比从母语到外语的译作质量更高”。^⑤ 在剑桥大学从事本科生和研究生翻译教学的卡雷拉斯（Angeles Carreres）的研究表明，欧洲许多学校都曾忽视非母语翻译教学，原因在于人们认为学生毕业后可能有从外语译入母语的机会，而非母语翻译不仅不现实而且毫无用处。^⑥

应该说，“母语原则”有一定的合理性，译入母语的作法从理论上说属于最佳选择。首先，一个人的外语水平特别是写作能力通常难以与其母语水平相媲美；其次，绝大多数情况下，非母语译者对目的语文化背景以及目的语读者的需求和接受习惯缺少充分了解，也就是说这种形式的文化输出有时带有一定的盲目性；最后，各种文化和语言总是处于发展变化中，由于非母语译者不具备目的语的社会生活背景，他们使用的语言往往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正因为如此，非母语译作的语言常常不够自然、鲜活，获得目的语读者认可的难度相对更大。

“母语原则”在理论上无可厚非，但在翻译实践中却难以完全贯彻。这一原

① Peter Newmark,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81), p. 180;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New York: Prentice Hall International (UK) Ltd, 1988), p. 3.

② Lawrence Venuti,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London: Routledge, 1995), p. 37.

③ Sophia A. Marmaridou, "Directionality in Translation: Processes and Practices," *Target*, 1 (1996): 59.

④ Natasa Pavlovic, "Direction in Collaborative Translation Processes," p. 6.

⑤ J. Dickins, et al, *Thinking Arabic Translation: A Course in Translation Method: Arabic to English* (London: Routledge, 2002), p. 2.

⑥ Angeles Carreres, "Strange Bedfellows: Translation and Language Teaching," *The Teaching of Translation into L2 in Modern Languages Degrees: Uses and Limitations*, accessed November 20, 2011. http://www.cttic.org/publications_06Symposium.asp; 1-2.



则明显忽视了非通用语言使用国的文化诉求，也与翻译实践的历史及现状不符。翻译不仅是文化输入的主要渠道之一，而且是文化输出的重要途径。实际上，对一些使用人数较少或者使用范围有限的语言来说，当目的语社会缺少足够的译者或者缺少翻译和引进其作品的动因时，这些国家会本能地由本土译者承担起对外推介本国文化的责任，以期减少翻译和文化交流中的“逆差”，并且在国际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同时，通常情况下，非母语译者对原作文本的理解更为深刻、全面、准确，而且在翻译当代作品时可以直接与原作者或其他相关人士进行沟通，这是非母语译者的优势所在。另外，如法国著名学者勒代雷（Marianne Lederer）所言，随着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的地位的日益提升，要让英语母语人士掌握足够多的外语，并且完全承担由各种语言到英语的翻译，这一想法是不切实际的。^①实际上，纽马克等并不否认非母语翻译在一些国家存在的必要性。^②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这种翻译对源语文化的意义，如澳大利亚学者坎贝尔（Stuart Campbell）认为译入第二语言的行为“与译入第一语言同样正常而且有可能同样普遍”^③；西班牙学者艾利森·毕比（Allison Beeby）曾在其著作中列专章阐述非母语翻译的重要性^④；波考恩（N. K. Pokorn）和巴甫洛维奇（Natasa Pavlovic）等也表达过类似的见解^⑤。

从母语到非母语的口笔译实践虽然从来都不是翻译活动的主流，但也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而且它在文化交流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正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同时，最近20年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有关非母语翻译的研究也日趋活跃。可以说，非母语翻译正在逐渐被视作一种常态的翻译行为，“母语原则”正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翻译活动从一开始就不是文化资本单纯地从非母语到母语的流动。在基督教初创时期，宗教翻译的方向并非人们考虑的问题，像西方第一部重要的圣经译本

① Mila Dragovic-Drouet, “The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During the Conflicts in the Former Yugoslavia (1991-1999),” in Myriam Salama-Car (ed.), *Translating and Interpreting Conflict* (Amsterdam: Rodopi, 2007), p. 37.

② Peter Newmark, *A Textbook of Translating*, p. 52.

③ Stuart Campbell, *Translating into the Second Language* (Harlow: Addison Wesley Longman, 1998), p. 208.

④ Lonsdale Allison Beeby, *Teaching Translation from Spanish to English: World Beyond Words* (Ottawa: University of Ottawa Press, 1996), pp. 5-9.

⑤ Nike K. Pokorn, *Challenging the Traditional Axioms*, pp. 34-37; Natasa Pavlovic, “Direction in Collaborative Translation Processes,” pp. 7-18.